

# 党内政治文化的具象化与建设逻辑<sup>\*①</sup>

刘红凇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复合概念,既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文化,也不同于他国的政党政治文化,而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政治实践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建设文化、改革文化、当代自我革命精神等的叠加体、复合体。从根本上看,党的性质、组织原则、组织体系等决定着党内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发展方向,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非党思想”影响,滋生出一些消极政治文化现象。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应该以“弘扬和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纠正与克服各种消极政治文化现象”为主题,正视受各种不良思想侵蚀而滋生的十种消极政治现象,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以“是否有效地抵制与解决了各种庸俗腐朽的消极政治文化及其现象、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检验标准,走良性循环、增量式发展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之路。

**关键词:** 党内政治文化;复合性特征;建设逻辑;实践进路

**中图分类号:** D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3-0001-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3.001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语境语义是准确理解问题的关键。从“党内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与使用情况看,在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同志首次使用这一概念,强调“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sup>②</sup>,要求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正向价值观、抵制和反对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这一基本要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重申、载入党章,并在2019年1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得到比较详细的阐述。从“党内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提出至今,习近平同志与中央的相关要求,都是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角度去立论部署的。然而,无论是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还是政治文化,都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整体性概念,非抽象建设所能成;要加强相关建设,必须具象化到现实党内组织体系、组织运作与政治行为上。聚焦到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本身,则不仅需要明确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与构成要素,更需要增强问题意识与实践操作性,厘清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机制、建设逻辑与实践进路。

## 一、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与复合性特征

就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者阿尔蒙德提出至今,仍是一

\* 收稿日期:2020-03-09

作者简介:刘红凇(1969—),男,山东泰安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2020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研究”(2020MYB049)和2019年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19ZDA008)的阶段性成果。

②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7年第1期。

个颇具争议的复杂概念,有的将其界定在思想观念层面,有的界定在政治心理层面,有的兼而有之。具体到党内政治文化,作为由“党内+政治文化”构成的复合词与复合政治现象,则更加复杂、更容易产生认识分歧,内观与外观、远观与近观等得到的认识明显有所不同。这种认识差异,并非仅仅由于观察者的立场不同所致,也有视角与“视距”因素。因此,要准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必须分清对象、对准焦距,正确认识政治文化、政党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的异同,克服与避免“大而化之”等模糊认识。这要求我们首先要明确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但也不能简单将政治文化之意套用到政党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上来,必须结合政党本质特点、中国共产党的特性等进行具体分析。

那么,作为一种客观政治现象,何谓政治文化?至今为止,阿尔蒙德和维巴1962年在《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中的定义与基本判断仍具代表性。阿尔蒙德等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即对政治系统作出自我认知的、情感的和评价的种种取向时所产生的不同种类的频率。在民族或国家政治文化层面,二人结合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等五国公民的政治态度的经验性研究,给出了值得借鉴的研究思路:一是聚焦“政治系统”来谈政治文化,而非仅仅就文化而谈文化。阿尔蒙德等认为,当说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时,所指的是“作为被内化(internalized)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这一政治系统包括政党、法院、宪法、国家历史等。二是在区分政治态度与非政治态度的基础上,将政治文化界定为人们对政治客体的一种“特殊政治取向”,这种“特殊政治取向”主要包括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三是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角度看政治文化,认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不是现代文化,而是一种现代与传统的混合文化”<sup>①</sup>。尽管阿尔蒙德等在相关研究中潜在地存在“美国中心主义”倾向,但其关于民族国家政治文化的定义与分析范式仍具可取之处。其中最大的可取之处,就是从调查研究出发、而非从模糊的“印象主义”出发来研究政治文化,将人们的政治态度与非政治态度区分开来,立足于政治系统、政治取向来研究政治文化,强调政治角色、政治系统结构在分析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时至今日,尽管“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提出已过半个世纪,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并提出了一些新定义,但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阿尔蒙德相关定义影响;尤其是阿尔蒙德等关于政治文化的分析范式,仍具借鉴意义。

聚焦到政党政治文化,无论是阿尔蒙德还是其他学者关于国家政治文化的定义,都不能简单套用到政党政治文化上来,也不宜把政党政治文化简单归结为政治意识或政治观念。因为政党与国家的性质特点有所不同,相关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特点也必然有所差异;不同政党的性质特点不同,其党内政治文化的特点也必然有所不同。概括说来,国家政治文化与政党政治文化之差异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体现:一方面,就权利与义务关系而言,公民与党员有所不同。一国公民身份往往“生而定之”、个人难以自主选择,公民权利往往生而有之、具有“权利优先”之特点;成年公民入不入党、是加入“甲党”还是“乙党”,个人具有自主选择权。但政党成员有所不同,各国政党对注册会员一般有一定年龄限制与政治义务的要求,如要求党员不能把公民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价交换原则等机械地搬到党内来,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政党文化是一种义务优先、纪律优先型的政治精英文化。<sup>②</sup>另一方面,就政治取向而言,阿尔蒙德等所言的公民文化之“政治取向”

<sup>①</sup>[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0、16、17、6页。

<sup>②</sup>郝铁川《两种文化辨》,《检察日报》1999年4月7日。

是单向度的,即公民对政治系统的政治取向,但政党政治文化所蕴含的政治取向是多向度的。因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党都是按照一定组织原则组织起来、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的政治组织,而且,只有赢得广大民众支持才能赢得政权。故政党及其成员所面临的政治关系,不仅包括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包括党员与党组织、党员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故政党政治文化所蕴含的政治取向至少有四个向度,即党员对党组织(包括组织原则与党内规章制度)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取向、党组织与党员干部对政治权力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取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民众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取向、政党组织对党员的政治要求、政治态度与行为规范。再一方面,就政治取向或政治认同而言,公民的政治取向、入党意愿等具有多样性;但政党成员的政治取向具有根本一致性,所有入党成员都要承认党的纲领和主张、遵从党的纪律、支持党的工作。总之,政党的组织性、政治性、纪律性等组织特点决定了,相较国家公民政治文化,政党政治文化具有义务优先、政治取向多维、全党具有根本一致性等显著特点;而且,政党政治文化不仅包括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等为主要内容的观念形态的“政治取向”,也包括实践形态的政治行为取向。对一个政党而言,政党政治文化是一种集体现象、集体文化,而非个体现象与个体文化;这种集体文化对全党成员的政治取向与行为方式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聚焦到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它既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文化,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政党政治文化;既不同于党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印象”与“政治取向”,也不完全等同于党内的自我政治认知与自我评价。从历史生成看,党内政治文化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组织原则、组织体系、政治地位等内在规定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精气神”的历史叠加与凝聚,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建设文化、改革文化、乃至当代自我革命文化的复合体。从现实角度看,党内政治文化是内化于全党成员之中的政治情感、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等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综合反映。这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sup>①</sup>要认识与理解上述判断与概括,需要深化三个方面认识:(1)中国共产党党内主流政治文化是由党性决定的,党性的相关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性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sup>②</sup>,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所在,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显著特点,等等。从根本上看,中外政党性质不同,党内政治文化必然有所不同、甚至差异很大。(2)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与执政地位所决定,执政以后党内政治文化具有了“权力秉性”。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唯一领导党,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sup>③</sup>,同时也是唯一执政党、执掌国家权力,“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已经成为党的基本政治理念。这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具有内外影响力,不仅包括党员对党组织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取向,也包括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公共权力、广大民众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取向。(3)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标准与价值标准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是党的自我评价取向与人民评价取向的统一体。尽管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都具

①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1页。

②《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9日。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有一定岗位职责,也都具有相应的工作评价标准,但是,党的性质决定了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sup>①</sup>。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各级党组织与党员干部不仅要用岗位工作标准来审视自己、评价自己,而且必须以人民标准来审视与评价自己的政治行为。

## 二、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基本类型

聚焦党内政治文化的组成要素,从应然看,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先进政治文化。但从实然看,党内政治文化犹如大树的年轮,承载着整个党的历史发展印记,并非由单一文化或某个时期的文化独立组成,而是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革命文化与建设文化、改革与创新文化等组成的混合文化。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光荣历史传统、植根于中华大地而不断发展壮大的百年大党。这决定了,在近百年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中,历史地形成了党的革命文化、建设文化、改革与创新文化,这已经成为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部分;而植根于中华大地发展,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的思想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在改革开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等也会侵蚀党员干部的思想,滋生形形色色的消极政治现象乃至消极政治文化。因此,从现实或实然看,党内政治文化不仅包括由党性所决定的主流政治文化,也包括一些非主流政治文化,甚至客观上也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非党文化”与消极文化。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任务,按照习近平同志所言,就是要“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sup>②</sup>。

聚焦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即通过弘扬和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消解与克服各种庸俗腐朽的消极政治文化及其现象,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滋养与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干事创业、清廉有为。简单说,就是要通过“正文化、正观念、正人心”来“正行为、正生态、正风气”。因此,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仅要正视党内潜在的各种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更要正视由这种消极政治文化所引发的各种政治现象,明确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聚焦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并非是指所有党建问题,而是特指那些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及其滋生的消极政治现象。对此,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人均有过相关论述。如在革命时期,1929年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列举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主观主义、机会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及其现象<sup>③</sup>,以及经常批判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都属于那个时代的党内消极政治文化及其现象。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所批判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都属于那个阶段的党内消极政治文化及其现象。<sup>④</sup>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严厉整治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四风”问题,习近平同志狠批的“七个有之”现象、在十八届六中全会讲话中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页。

②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7年第1期。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93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7页。

强调的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sup>①</sup>,以及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列出的要坚决防止和反对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都是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另外,2016年《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列举的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绝大多数都属于党内消极政治文化现象。对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抵制和反对的各种消极政治文化及其现象,不难发现,毛泽东、邓小平所批判的消极政治文化现象在当代并未“销声匿迹”,有的依然“阴魂未散”,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变化而已。概括说,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需要破除的消极政治文化及其现象,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十种类型:

一是受封建主义残余侵蚀而滋生的特权思想与特权现象,如习近平同志批判的“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现象,以及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现象等。<sup>②</sup>这一现象的实质在于将“公权”异化为“封权”“私权”、将“为人民服务”异化成为个人和家族服务。对这种现象,习近平同志明确要求“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人管起,从最近身的地方构筑起预防和抵制特权的防护网。”<sup>③</sup>

二是受封建专制主义侵蚀而滋生的“家长制”“一言堂”现象,如习近平同志批判的“有的独断专行,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内民主得不到充分保障,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受不到有效制约”<sup>④</sup>以及由此滋生的封建官场术、“厚黑学”“潜规则”现象。这一现象既与封建主义有关,也与国际共运史上、计划经济年代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机制有关,其实质在于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把“人民民主”异化为“家长制”、把“人民公仆”异化为“替人民当家作主”。

三是受官僚主义腐蚀而滋生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如“官气十足、独断专行,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都要自己说了算,拒绝批评帮助,容不下他人,听不得不同意见”,“工作上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得过且过”“对上吹吹拍拍、曲意逢迎,对下吆五喝六、横眉竖目”现象<sup>⑤</sup>,以及新滋生的“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为官不为”“技术官僚主义”等现象。官僚主义既与封建“官本位”意识有关,也与科层制、行政化有关,更与“权力异化”密切相关,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其实质在于以官为本、以民为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反对官僚主义“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sup>⑥</sup>。

四是受形式主义腐蚀而滋生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如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规则落实制度现象,热衷于造声势、吹喇叭、喊口号、出风头、讲排场、搞仪式现象,调查研究热衷于摆姿态、出镜头、露露脸现象,热衷于搞数字造假、“数字报表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新的“党八股”现象,等等。从根本上看,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伴生物”“衍生物”,没有官僚主义,所谓的形式主义必然会失去市场;其实质在于“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

①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7年第1期。

②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7年第1期。

③习近平:《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人民日报》2017年2月14日。

④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1-312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4页。

弄虚作假”<sup>①</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反对形式主义要“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sup>②</sup>。

五是受宗派主义侵蚀而滋生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如习近平同志所批判的“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这三个“有之”现象<sup>③</sup>,以及山头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现象。对于这种现象,习近平同志明确警示“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sup>④</sup>

六是受个人主义侵蚀而滋生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如习近平同志所批判的“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这两个“有之”现象<sup>⑤</sup>,以及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现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现象,纪律松弛、不思进取、不敢担当、庸懒无为等现象。

七是受教条主义侵蚀而滋生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如“主观主义”“本本主义”现象,轻视调查研究、忽视民意、闭着眼睛决策与瞎指挥现象等。对于这些现象,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任何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效果。”<sup>⑥</sup>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导向,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八是受本位主义侵蚀而滋生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如缺乏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核心意识,只顾本位与小团体利益、不顾整体利益等现象。对于这种现象,习近平同志强调“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sup>⑦</sup>

九是受拜金主义腐蚀而滋生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如搞权钱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官商勾结、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贪污受贿等现象。这种现象既与市场经济负面影响密切相关,也与资本主义思想腐蚀有关。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就会产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人家请君入瓮了。”<sup>⑧</sup>

十是受享乐主义侵蚀而滋生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上,二者相辅相成、交相呼应。其中,享乐主义现象主要表现在信念动摇、意志消沉、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情趣低俗,玩物丧志,沉湎花天酒地,热衷灯红酒绿,纵情声色犬马”,奢靡之风主要表现在“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甚至道德败坏、生活放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sup>⑨</sup>。对此,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反对享乐主义要“着重克服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反对奢靡之风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0-31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4页。

③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7年第1期。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

⑤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7年第1期。

⑥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2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9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2页。

要“着重狠刹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sup>①</sup>。

上述十种消极思想、消极政治文化及其消极现象,在党内虽然不是主流,有些问题如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已经得到有效解决;但有些问题却比较严重,有些问题“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死灰复燃”。这些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sup>②</sup>,需要下大力气进行系统解决。

### 三、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逻辑与实践进路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新命题。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角度,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先进的政治文化与价值观、抵制和反对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那么,聚焦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本身,如何才能将“倡导和弘扬先进的政治文化与价值观、抵制和反对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这才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不能停留在党内政治文化“是什么”“为什么”上,也不能简单地就“政治文化”本身而谈政治文化建设;必须对党内政治文化进行“反观”,深刻认识其形成机制与发展逻辑,结合现实组织体系与组织运作等,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进行系统思考。

前文已言,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三者相辅相成,且都是比较抽象的整体性概念,难以抽象地去建设与发展。对于如何才能严肃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习近平同志相关讲话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建设思路,突出强调“准则管不管用,关键看能不能执行到位”,明确指出检验准则是否执行到位的判断标准与检验标准即“关键看是否有效解决了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并围绕怎样将准则执行到位,给出了“五管齐下”的系统性建设方案,即一要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二要抓好严明纪律这个关键,三要抓好选人用人这个导向,四要用好组织生活这个经常性手段,五要抓住继承和创新这两个关键环节。<sup>③</sup>这一系统性建设方案,不仅涉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需要做的五个方面的工作,而且明确指出了建设的关键问题与检验准则,值得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借鉴运用。

结合党内政治文化的复合性特点与时代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借鉴习近平同志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系统性建设方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即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一项深层次的基础工程,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增强问题意识与操作性、具象化到党内组织系统与政治行为,需要“浚其源、涵其林,养正气、固根本,锲而不舍、久久为功”<sup>④</sup>。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进路,应该以“弘扬、培育、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纠正与克服各种消极政治文化现象,消解各种消极政治文化的滋生蔓延”为主题,以把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贯彻落实到党员干部思想与行为之中作为建设关键,坚持“观念—制度—行为”相辅相成,坚持标本兼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进思想政治观念与政治取向为先导,以严整各种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现象为切入点,以建立科学完善的选人用人体制、建设高素质的执政骨干队伍为重中之重,以健全、完善、严明党内法规制度为根本保障,坚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4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4页。

③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7年第1期。

④习近平《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人民日报》2018年7月1日。

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形成时代先进政治文化相结合,以“是否有效地抵制与解决了各种庸俗腐朽的消极政治文化及其现象、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判断标准或检验标准,走良性循环、增量式发展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之路。具体说来,以下三个方面需要进一步阐释:

聚焦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先导,其关键在于:深刻分析党内政治文化各组成部分的时代性与先进性,科学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成功经验,坚持以新思想、新观念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改进政治观念与政治取向,有效实现党内政治观念的时代更新与政治取向的“时代前移”。因为,从根本上看,思想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思想政治观念就会导致什么样的政治行为。就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看,尽管其成因很复杂,但任何一项党内消极政治文化现象背后都有迂腐思想观念与权力异化的影子。这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sup>①</sup>概括说来,新时代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进政治观念与政治取向,其着力点主要有二:一要对党内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进行科学分析。从构成看,党内政治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革命文化与建设文化、改革与创新文化等的混合体,其中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都有时代性,都是特定时代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的“精神升华”与“情感凝聚”。从当代反观之,过去形成、过去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并不一定适应当代发展要求,必须加以“过滤”与“扬弃”,取其精华、剔除不合时宜之处。比如,我们党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再革命”,而是为了和平建设、人民生活更美好,为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履行党的责任与使命;因此,今天看来,革命精神、革命文化永存,但绝不能将革命思维、运动模式等简单套用到今天的政治实践中。二是要科学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成功经验,用新的政治思想观念来覆盖过时的旧观念、引导新的政治取向。概括说,坚持法纪分明、公私分明、纪在法前、从严治党、权责统一、依法治权、全面监督、有效问责等,乃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成功经验,理应成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新观念新取向。这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让党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优良传统深入党员、干部思想和心灵。”<sup>②</sup>

聚焦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切入点,其关键在于:要坚持问题导向与实践导向、找准切入点与突破口,有效解决好“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问题,切实增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践性与操作性,克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抽象论”。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成功经验看,以“八项规定”为起点、以严整“四风”为切入点,从严从细从实狠抓作风建设,由表及里、循序渐进、标本兼治,可谓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成功之道,值得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借鉴与弘扬。因为从根本上看,党内政治文化就是一种政治情操、政治风尚、政治风气。前文所言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十种突出问题,有的属于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问题,有的属于学风、文风、会风问题,有的属于政治品德、生活作风、家风问题。因此,继续以严整“四风”为切入点,从严整“四风”延展到严惩“七个有之”,再到全面整治由封建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教条主义、本位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侵蚀而滋生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不失为新时代加强政治文化建设的有效切入点与实践进路。

聚焦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点对象与关键制度,其关键在于:坚持用科学理念指导、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进一步完善选人用人制度、体制与机制,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4页。

②习近平:《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人民日报》2018年7月1日。



风优良、奋发有为、为民务实清廉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这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关键是坚持好干部标准，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sup>①</sup>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而言，亦是如此。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点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关键性制度是选人用人制度。这一方面是因为，选贤任能问题始终是治党理政的首要问题、根本问题、关键问题。常言道：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则蔚然成风。无论在革命年代、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还是新时代，“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sup>②</sup>。另一方面是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严整“四风”、要求“三严三实”、狠刹“七个有之”现象，所针对的重点对象，都是各级领导干部，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而搞“七个有之”。<sup>③</sup>那么，如何才能选好、用好、管好干部？其关键就是坚持科学理念与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着眼于党的事业发展需要选人用人，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充分做到“公道对待干部，公平评价干部，公正使用干部，敢于坚持原则，让好干部真正受尊重、受重用，让那些阿谀逢迎、弄虚作假、不干实事、会跑会要的干部真正没市场、受惩戒”<sup>④</sup>。只有建立起科学完善的选人用人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有效规范党员干部的思想与言行；只有通过“正言行”来“正人心、正文化”，久久为功，养成习惯，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才能蔚然成风。

### 结语

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角度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必要举措，三者相辅相成，又都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聚焦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本身，则需要根据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主题、关键问题与检验标准，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严整各种庸俗腐朽的消极政治文化现象、建立科学完善的选人用人制度、健全并严明党内法规制度等几个方面多管齐下、进行综合治理。其中，第一项对应着党的思想建设，第二项对应着党的作风建设，第三项对应着党的组织建设，第四项对应着党的纪律建设与制度建设。故放眼整个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无论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还是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乃至反腐败斗争，都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即整体中的一部分。无论研究其中的哪一方面内容，从根本上看，都是研究党的建设的一个视角、一个切入点，只是不同研究视角的聚焦点、侧重点、着力点有所不同。因此，无论党的建设的哪一部分内容、哪一项具体措施，都难以孤立地来做；其科学有效的建设思路，归根到底，都必然要归结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与战略布局上来，都要遵循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基本规律，都需要注意党的建设整体性、系统性与逻辑性。

①习近平《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 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人民日报》2013年6月30日。

②习近平《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 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人民日报》2013年6月30日。

③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7年第1期。

④习近平《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 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人民日报》2013年6月30日。

## Visu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Logic of the CPC's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Liu Honglin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relatively abstract compound concept, either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political culture or different from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in other countries. Rather, it is the superposition and compound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construction culture, reform culture, contemporary self-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others. Fundamentally, the Party's nature,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and organizational system determine the mainstream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however, it is also inevitably affected by various "non-party ideas". In the new era, the theme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should be "promoting and developing a positive and healthy political culture within the Party, and correcting and overcoming various negative political cultural phenomena". We should face squarely the ten negative political phenomena, adhere to seeking both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solutions and to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take as the inspection standard "whether or not to effectively resist and resolve various vulgar and decadent negative political cultures and the phenomena and form a clean and upright political ecology", and take the road of a virtuously circling and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CPC's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Key words:** the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CPC; compound characteristics; construction logic; practice approach

责任编辑:王盛辉